

人·人·人

——个体经营成功者面面观



主编 刘里江 庞士忠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人·人·人

——个体经营成功者面面观

审 定：王启明

主 编：刘里江 庞士忠

副主编：张 丽 徐宝库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3.12

(京)新登字: 121号

书 名: 人·人·人——个体经营成功者面面观

著 者: 刘里江 庞士忠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陆军参谋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版 次: 199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5.8

字 数: 140千字

印 数: 4000

书 号: ISBN7—80027—523—×/I·160

定 价: 6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因印装质量问题,可退本社调换)

目 录

杨木森的做人信条.....	刘里江 庞士忠 (1)
赵明掂量良心的斤两.....	齐忠亮 (17)
张艳宁粉笔里蕴藏着滚烫的心.....	傅溪鹏 (33)
甄“老大”好好闪光一次.....	张 丽 (40)
仝永发不能忘，也忘不了.....	余义林 (54)
李宝玉哭也是歌，笑也是歌.....	南 雁 (65)
高金潮以正气迎天地，有大功于国家.....	南 雁 (81)
专给大地做衣服的陈明星.....	刘里江 庞士忠 (96)
架彩桥的人张双喜.....	徐宝库 (112)
奇女子刘志桂.....	余义林 (127)
王凤成置身于磨难与阳光之间.....	刘 虔 (141)
章锦武干个体可真不容易.....	徐宝库 (154)
运景华小卒敢拱“车马炮”.....	王凤玲 (169)
任景才做个体户的带头人和奉献者.....	傅溪鹏 (175)

杨木森的做人信条

陆军参谋学院 刘里江 庞士忠

今年53岁的杨木森，看上去顶多也不超过40岁。他红光满面，春风得意，见着我们不无感慨地说：“做人不简单呵！”接着，我们的话题便围绕着“做人”这个中心展开了开来。

他告诉我们，是党的富民政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忽如一夜春风来，才使神州大地上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个体户。杨木森，也在保定市青苑县县市两级众多个体户中脱颖而出。他不是旧社会普通的个人发家致富的那种人，也不同于今天一般的个体户。他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搞个体之前曾任青苑县马庄乡的经委副主任。党的多年培养教育是他做人的思想基础，在个体经济的活动中又不断荡涤着他的灵魂，他意识到，个体户首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因为个体户本身就是有血有肉、充满七情六欲的人，而且是刚刚从贫穷走向富裕、由落魄走上成功的新人。

“个体”二字，其中的“个”字是由一个擎天柱支撑起来的一个“人”字，“体”字是以“本”为依附的一个“人”字，“个体”二字均离不开“人”字。既然如此，如何学会做人，乃是个体户人生的第一要义。

杨木森有他做人的一些信条，在从事个体经济中，他也自始至终地遵循这些信条。

做人不能只顾自己

杨木森成了百万富翁，可他常说：“富了不是我的心愿，全国人民都富才是我的心愿。”他自幼生长在河北保定市青苑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是一块富于反抗和斗争精神的热土。前辈们为了翻身求解放曾抛头颅、洒热血，历史上著名的高蠡暴动、保定二师学潮就发生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多少象《红旗谱》里朱老忠那样的好汉背井离乡，携着妻儿老小去闯关东。从小没有父母的杨木森，虽然没怎么受过旧社会那样的苦难，但对家乡的苦难也略知一二，他热恋家乡这块土地，魂牵梦绕想的是使家乡这片土地红火起来。

还是在1986年前，他当青苑县马庄乡经委副主任时，就发动全乡人民在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大搞副业。他带头搞竹编业，编的竹编躺椅很有名。为了响应党的关于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的号召，他在当了四年经委副主任、已端上了铁饭碗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决然地回乡搞个体，于1987年办起了冶炼厂，从各家各户回收破铜烂铁，制成铝锭、铜锭，销往北京、天津等地，很快就腾腾火火地富了起来。杨木森致富的消息，很快被天津市静海县的大邱庄捕捉到了，他们先是派人去聘请杨木森到大邱庄，杨木森对来说：“我是保定市人，是保定市下辖的青苑县人，更是马庄乡人，这里的人民富不起来，我哪里也不去！”

大邱庄的来人看用优惠的政策拉不走杨木森，便在青苑县投资办厂，明眼人一看，心里就明白，这是冲着杨木森来的。杨木森心里也明镜似的，他们是想用这种办法把我挤垮，然后再把我拉走。于是，他便铆足了劲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杨木森是青苑县个体协会理事，县政协常委，保定市人大代表。他为了把乡里的个体经济发展起来，把全乡人民都带动起来，真正把全乡的扶贫工作搞好，他心里有一本小九九，他清楚地精确地统计过，光周围的特殊贫困户就有27户，这是他重点扶助的对象，从自家拿出11万元借给这些人，帮助他们搞家庭副业，并让家家都盖上了新瓦房。这些贫困户眼含热泪说：“老杨可帮了我们的忙，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这27户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却了杨木森心头的一件大事。可是，如何带动全乡人民共同致富又时刻挂在他的心上。青苑县马庄乡主要是以农业为主，要想富起来，必须从副业上打主意。杨木森想到河北保定是联结南北的重镇，他组织乡亲们北上南下，北上去东北承包苇塘，把东北优质的芦苇大批地运来，让大家编苇包、苇席卖钱。南下去湖广调来大量毛竹，经过加工搞竹编业，编成各种竹制家具、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仅一冬一春，全乡搞副业的收入就能达到三百多万元。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小工厂，东于庄、西于庄、刘庄这三个村子从东北调苇子，1991年，东西于庄两个村净挣170多万元，刘庄挣40多万元。杨木森所在的小东庄净挣130万元。这个乡的老百姓今非昔比了，家家过上了舒心的日子，谁也忘不了共产党员杨木森带头帮着大家致富的恩德，人们都说，杨木森走个体之路还是象以前当乡经委副主任那样，一点没变。他在个人富起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还处在贫困线上的乡亲们，他们一天不改变处境，他的心绪时刻不得安宁。只有大家都富起来，这才是他最大的心愿，心灵才能得到最好的慰藉。

在和杨木森交谈中，他说，个体经济的存在，是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无论个体经济，还是集体经

济、国营经济，其载体都是人，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一种经济活动。那末，人的素质如何，对这些不同层次经济形式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集体经济活动中人们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以致使人们挫伤劳动积极性的教训，杨木森联想到，个体经济暂时搞上去了，如不注意端正人们素质上的某些方面，就将使个人利益至上，发展成极端的个人主义，只顾自己发展，不顾他人死活。这种自私的心态，将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极大的危害。因此，他在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中，把做人不能只顾自己作为自己人生的一大信条，心中时时装着乡里的特殊贫困户，想着还处在贫困线上的大多数父老乡亲。

就是同别的私人企业家竞争，杨木森也不是以邻为壑，或者是见着别人濒临破产而幸灾乐祸、见死不救。他深刻想到，自己这棵杨木再森郁，也成不了茂盛的树林，只有众多个体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如雨后春笋，使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真正把乡亲们带动起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他见到邻乡的企业家在经营中遇到难题了便心急如焚，比自己办的厂子遇到困难还揪心，吃不下，睡不实，不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心里总也不落底。禹城高福顺办的汽车底盘厂有三十几号人，他们因管理不善，化铝锭赔了7万元，化铜锭赔了11万元，共赔18万元，上下一片混乱，处于倒闭状态。杨木森看到竞争对手这样，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高福顺厂子倒闭可以少一个“闯业冤家”，而是想到这三十几号人以及他们几百口家人今后的日子如何过？是拉一把，还是推一把，需要杨木森当即作出抉择。接到高福顺求援的电话，杨木森二话不说，向家人作了简单交待，立即赶赴禹城。到了高福顺的厂子，全厂三十几号人象见到天上来了大救星那样，把杨木森奉为厂子起死回生的尊神。高福顺更是

感激涕零：

“老杨大哥，没想到你接到电话，立马赶到这里。”

“救厂如救火，一点也不能耽搁。”杨木森回答道。

说完，杨木森脸也没擦一把，烟也没抽一口，绕着厂子走了一遭。他见到破败的厂子，到处是垃圾，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地上捞闲瞓，冶炼炉早已熄灭。他边和工人们打着招呼，边寻问厂子的近况。工人们听说他是高福顺请来救厂的大名鼎鼎的杨木森，见到一米八的个头儿，慈眉善目，便生几分好感，主动向他介绍厂子里的人心不齐，各顾自己，谁跟谁都有意见，互相瞧不起，拳头攥不到一起。他找到症结后，跟大家耐心地讲，光讲发展经济这句话并不完整，没有人材的管理，厂规不严，等于破烂摊子一堆，发展经济便没有组织基础。告诫大家要建立一个厂规，并帮助高福顺整顿这个厂子。厂子因家底空虚，没有资金，杨木森凭借自己的关系，进行多方筹措。杨木森不分黑夜白天地干，在一个月的时间，使这个厂子盈利14万元，他一个子儿也没拿。厂子里的工人们过意不去，非要他拿一份应得的报酬，杨木森婉言谢绝：“我还在乎这点小钱！你们消除派性，大家齐心把厂子办好，不给党的富民政策抹黑，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杨木森见到别的乡的个体和私营企业遇到困难，不仅自己及时赶到解决难题，而且还经常拿钱资助。如戴河明办的养鸡厂赔了，杨木森借给他2万元，用于资金周转。杨木森想到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把象高福顺、戴河明这样的个体、私营企业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也象自己一样再帮助别人，不要只顾自己的精神便在众多个体户中传播，发扬光大。这样，个体户、私营企业人员的素质也必将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样，也才会净化社会空气，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发展。

做人不能离支柱

杨木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悲惨的岁月。虽然，他自认为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1959年参军，1963年复员回乡，对党一片深情，但是，在这场浩劫中，他也在劫难逃，没有逃过这场灾难。原因是他复员返乡后不甘寂寞，接着在禹城等几个地方办起了生产水泥厂的麻钢球的小厂子，每月都要向公家交税金30元，小队给开发票，大队盖公章，来往帐目清楚。杨木森是在别人搞派性、挑起武斗破坏生产的情况下，自己组织一些人把废铜烂铁变成工业生产用的零件，并没有搞倒买倒卖，而且照章纳税，但还是被当时的所谓革命组织打成“地下黑工厂”，批判了好多年，大年初四就要打着铺盖卷到公社参加学习班，让人割资本主义尾巴。象这样参加学习班的事，至少也有五、六年之多。

为什么过去那么卖力地干也富不起来，而如今竟神奇般地富了起来？杨木森心里总在琢磨这个问题。那时是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杨木森这棵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小树遭到厄运是势在必然。杨木森从自己今昔的对比中，感到杨木森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英明伟大，是青苑县马庄乡的乡亲们厚道实在，是党和人民群众这根擎天柱支撑着杨木森做人。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再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党还是这个党，群众也还是这些群众，在文化大

革命中和现在却判若两人，关键在于路线。那时的路线“左”得要命，群众的情绪被派性鼓动起来，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保定的武斗、派性当时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谁提发展经济、搞好生产，谁便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唯生产力论者，而当时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无论如何生产也促不起来。现在，党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乡亲们又热情支持保护自己，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杨木森深感党和人民群众是自己精神上的两根支柱，并把他们奉若神明。到任何时候，无论自己富到那个份儿上，也离不开党的政策的指引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人要有良心，要知恩必报。这是中国农民做人的最基本准则，杨木森毫无例外地也汲取了这些美德。

马庄乡政府的房子年久失修，一遇雨天，用乡党委、政府的干部的话说是“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滴嗒。”机关干部都要穿着雨衣、雨鞋，打着雨伞在屋里办公。乡政府因财政上有赤字，抽不出款项维修房子。往县里有关部门打报告，也迟迟不见回音。杨木森一次去乡政府办事，见到此情此景，找到乡领导说：“我拿出点钱给你们修理一下房子吧！”

乡领导说：“你挣的那点血汗钱也不容易，还是请上头拨款修理吧！”

“我再不容易也比你们的境况好，看看你们这哪像个办公的地方，简直成了水帘洞了。你们到西天取经，修成正果，也不能不要小民的一点赞助吧。人家唐僧师徒一行四人那么大的能耐，还到民间乡村小屋接受施舍呢。”

杨木森是把党的基层组织——乡党委所在地看作一座圣地的，在他的心目中，乡党委是传达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地方，它的存在举足轻重。自己曾在这里工作过四年多时

间，多少还有点怀旧情绪。自己从这里走出去，成了气候，与这里的熏陶影响是无法分开的。于是，杨木森不由分说，拿出三千元给乡政府修房子。乡政府雇的炊事员，每月工资三百元，也是杨木森给出的。

乡政府有困难，杨木森主动拿钱赞助。国家有困难了，国家和乡政府相比，离得这么远，杨木森是否无动于衷呢？或者因为乡政府是直接管辖自己的机构，你国家再大离这也是山高皇帝远，管不着这么远的地方，对此可以置若罔闻呢？不是的。杨木森把乡、县、省以至国家的事情看成一体，这些与自己这个个体户血肉相连。有国才有家，有组织才有个体，国家及各级组织是支撑个体户的坚强支柱。做人离不开支柱，否则，“个体”的“个”字是挺不起来的，上边那个“人”字也不可能顶天立地。因此，杨木森把国家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1990年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特大洪灾，那里灾区的人民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难处，他想到1963年河北遭受洪灾时自己曾吃过外省的萝卜干，现在对别人的困难不能坐视旁观，他组织家人连夜磨制五千斤面粉，并赶制一百条面袋，上面写上“慰问灾区的乡亲们”的大字，交给政府转送到灾区。

国家号召发展教育事业，可小东庄小学的校舍破败不堪，上级也抽不出资金加以修缮。一次，杨木森从北京办事在回村的路上，碰见一群群孩子在路上玩，他问这些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孩子们说：“教室里漏雨，没法念书。”他拿钱买十五捆油毡纸，铺在校舍的房上面，暂时遮雨，让学生及时复课。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他又拿钱买15万块红砖，盖了24间教室，做了50套桌椅板凳。杨木森吃过没有文化的苦，小时候没有父母，没人供自己上学，那是在黑暗的旧社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好了，再也不能让这些孩子重

蹈自己的覆辙，当睁眼睛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千秋大业，自己拿出点钱支援教育，就是为国家这个支柱加固基石。

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千千万万包括农家子弟在内的青年人组成的队伍。杨木森当过五年兵，对人民军队充满难以言喻的真情，毕竟这所大学校对他有教导哺育之恩，杨木森对烈军属，这些曾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而献出亲人们的人们，怀有崇高的敬意。全乡115户烈军属、五保户的冷暖，他时刻放在心上。认为没有这些人们作出的牺牲，别说发展个体经济，就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不会存在的。关心烈军属，时刻把温暖送到他们那里，就是使社会主义祖国这一个体户的支柱上面的柱石，更加牢靠、坚固，永远也不会动摇它的根基。杨木森经常出钱资助亲人解放军的亲属，特别是那些孤独的烈属们，他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三、五千元不等，把这些钱送到他们的手里，略表一点心意。

做人不能忘了根本

杨木森的日子过得腾腾火火，既搞工业，冶炼铜锭、铝锭出售，又搞副业，编制苇包、苇席、竹制家具及各种工艺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是农民出身。他说：“农民的根本，农民的本职是种好地，多打粮。我们搞工业、搞副业，是以工养农、以副养农。”

他这一代私营企业家、个体户，事业飞黄腾达到何种地步仍抹不掉他们出身于农民阶级的痕迹，处处显示着农民阶级的纯朴勤劳的品格，对于土地，这块孕育着他们的丰腴的土地，对于土地给他们丰厚的馈赠，始终抱着一种崇高的敬业精神。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担任乡经委副主任

之前他就曾承包过60亩地，农民与土地紧密结合，冲破极左思潮的禁锢，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产量照过去生产队大幅度增长，每年他都能上交给国家几万斤麦子。后来，搞个体发展工副业，人手不够了，他仍没有放弃种地这个行当，还是种了20亩地，并饲养两匹大马，一头骡子，还拴了一挂大车。

现在，据一般估算，他这一代以及他子女这一代光吃利息都够花了，吃不完，用不尽，他还是让妻子儿女在土地上操作。他家现在有十余口人，老伴张兴菊贤慧能干，身体特别好，她曾连续六天六夜押车去北京送货，没合过眼，没吃上一顿热乎饭菜，怀里揣着几个干巴馒头和几块咸菜凑合吃。杨木森的儿女们也受家里大人的影响，都养成了劳动的习惯，他二女儿从8岁开始就喂家里的两匹马、一头骡子，一直喂到13岁，她还和母亲套马车到地里拉玉米。张兴菊除了做地里的活外，还在家里养了三百只鸡。

有一年夏天割麦子时，别人家割了一天麦子累得直不起腰，上炕睡觉都费劲。可杨木森家在割完麦子后，回家啃几口馒头，喝点热乎汤水，又连夜到地里扣麦茬，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钟。老伴张兴菊心疼杨木森，烙了几张油饼，摊了一盘子鸡蛋，放在篮子里，用毛巾捂严，送到地里，让杨木森补充点营养，并劝说：“孩子爹，明天再干吧！”杨木森说啥也不肯回去：“明天还有一桩买卖要做，这麦地不扣完，睡觉也不踏实。”就这样，干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整片麦地都露出了黑茬，杨木森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拉着牲口朝家里走去。

孩子们见到父亲累成这样，说：“爹，咱们钱这么多，还种地干啥？现在都八十年代了，谁还象你这样干！”

杨木森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八十年代咋的啦？就

是九十年代，一百年代，到了2000年，也得种地。到那时，谁也得吃饭。农民不稀罕土地，就是不守本份。不守本份的人，早晚吃大亏。”他又和孩子们算了一笔帐，家里的地每亩一年出产200元，那么十亩地至少挣2000元，咱家20亩地就是4000元的进项，这也就等于一般工作人员两年的收入。杨木森还对孩子们讲，农民离开土地就失去了根，忘了养育自己的厚土，就算是忘了根本，也构不成“个体”里面“体”字的丰富内涵，老父我杨木森也失去了做人的根本。种地的收入虽赶不上搞工副业那样来钱快，但这样来的钱实在、长远，花着也感到沉稳。

杨木森不但自己首先把地种好，而且对小东庄庄稼的长势非常关心。有一年，正赶上小麦返青需浇水的季节，村子里的输电线被盗，家家户户的麦地干得裂开了缝，小麦也因不能及时吸收水分而由青变黄。村里安装新的电线需要钱，可这时是春节刚过，各家手头都很紧，一时也凑不起好多钱来修电线。尤其是有些人担心，修好了电线再被盗咋办？还有的说，这是大家的事，反正又不是我一家受益，谁也不愿挑这个头修电线。人们都在观望着。可是，节气不饶人，这时天气变暖，干旱的土地又被燥热的春风刮得连一点水气都没有，麦苗象有生命的小精灵企望着人们送来甘甜的地下水。种了一辈子地的杨木森深知，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点也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他在自己资金也不宽裕的情况下，多方筹措三千二百元买电线，给全村的小麦浇上了水，这一年的丰收终于有了保证。

农村要想富，必须修公路。公路对农业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么公路就是使农产品输送到各地成为商品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受阻，在闭塞的小农经济王国里，个体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

彻落实，都将受到制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的农民日夜盼望能有一条乡村公路通到县城，通到保定，通向奔腾的喧嚣的市场经济的海洋。可是，人们多年盼哪，想啊！路在那里？路在何方？幻梦总也成不了现实。小东庄象杨木森这样的个体户们，向乡里建议，大伙集资修公路，得到乡党委、乡政府领导同志的首肯。不到几天，十五万元集资款到手了，光杨木森一家就拿出五千元。乡里看到杨木森一家出的钱多，要把公路修到他的家门口，杨木森的老伴张兴菊说：“公路修到俺家门前，得答应俺一个条件。就是修这段路的钱由俺自家出，不让人家说三道四，说俺平白无故地占人家便宜。不收钱，就不修！”乡里负责修路的同志只好答应了她的条件。谈到老伴张兴菊，杨木森脸上充满了自豪感，他说：“我老伴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我们家的一贯家风，从不占别人的便宜，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劳动，去创造劳动果实。这也是农民企业家发家致富的绝招和笨招。比如，农村的农业贷款，上级拨来后，我家历来是一分钱也不争、不要，首先推让给别人。我每年都要向国家交个人所得税六万多元，有一年马庄乡上缴国家税款还差二万元没有完成任务，我给交了。由于我们这里的一些个体户，都合法经营，照章纳税，这个乡上缴国家的税款，每年均能超额完成。我们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既继承了农民阶级的聪明天赋，更保留了农民阶级的本份品德，到啥时候，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做人不能没有亲情

现在，杨木森一家已有十余口人，主要成员除老伴张兴

菊外，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大姑爷是乡里的民政助理，二姑爷在工商局工作。两个女儿结婚后，都和杨木森在一起过。两个儿子年纪小，正在读书。村里人对杨木森的两个有正式单位上班的姑爷同搞个体的岳父一起过日子，都刮目相看。并不是两个姑爷看重岳父的产业，岳父也不是看重姑爷有正式职业的权位，而是一种人类至高无上的亲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父慈子孝，杨木森是在别人把一个姑爷当半个儿的世俗看法下，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姑爷视同己出，当成亲生的儿子一样看待。两个姑爷在外边挣钱无须交“公”，留着他们各自的小两口零花。姑爷在家也不是坐客，工业、副业，屋里屋外的活计都抢着干，进进出出地、高一声低一声地“爹、妈”叫着，其乐也融融。

享尽人间天伦之乐的杨木森没有忘记自己的大哥杨羊儿。杨羊儿小名绵羊，老实厚道，从小和弟弟相依为命。父母去世后，他命苦，感到弟弟的命更苦，他象父母那样，加倍地给弟弟木森以更多的父爱和母爱。在出外放羊时，烧一块红薯，自己也舍不得吃，捂在破衣服里，包着留给木森吃。遇到什么事，哥哥都想着弟弟，让着弟弟。在杨羊儿的庇护下，小木森和有爹娘的孩子一样不受别人欺负，没什么两样。后来，杨木森长大参军，每回往家写信，都十分惦念长兄如父的大哥和老嫂比母的大嫂，忘不了他们的哺育之恩，真是骨肉亲是至亲，砸断骨头连着筋。

杨木森复员回乡成家后，与大哥、大嫂分家另过。哥俩名义上是分家，实际上两家拆开墙是一家，不拆墙也常是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用杨木森的话来说是“我们哥俩不分”。别看杨木森平时过日子节俭，出门办事从不抽好烟、不下饭馆，可他在老哥哥身上可舍得花钱，碰见有什么稀罕物，什么